
中大管理研究

China Management Studies

2009年 第4卷 (3)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大管理研究

China Management Studies

第4卷 (3)

李元昌 冯源文 郭德昌

潘新翰 陈德林

(C-卷) 第4卷 (2009) 中大管理研究

主编 李元昌

经济科学出版社 北京 100029 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8号 邮编 100029

010-64182828 010-64182828 010-64182828

网址: www.ces.com.cn

电子邮箱: ces@ces.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8号

邮编: 100029

010-64182828 010-64182828 010-64182828

010-64182828 010-64182828 010-64182828

010-64182828 010-64182828 010-64182828

(经济科学出版社 北京 100029)

(经济科学出版社 北京 100029)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大管理研究. 2009 年第 4 卷.3/ 李新春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58-8614-8

I. 中... II. 李... III. 企业管理-文集 IV. F27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9359 号

责任编辑: 文远怀 卢元孝

技术编辑: 潘泽新

中大管理研究 (2009 年第 4 卷-3)

李新春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室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com.cn

北京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8.75 印张 165 000 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58-8614-8 定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1 中国管理研究之展望——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
Jay B. Barney 张书军
- 16 会计准则国际化的经济后果——来自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日市场
反应的初步证据
方军雄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竞争优势与投资绩效研究
刘阳春 吴 瑶
- 61 CEO 特征与国际化战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宋渊洋 唐跃军 左晶晶
- 78 股权分置改革的短期市场效应与长期公司绩效
任广乾
- 101 基于SVAR的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证券期货市场收益率的溢出效应研究
黄飞雪 寇 玲 谷 静 王 云
- 127 《中国会计学刊》征文启事

CONTENTS

- 1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Versus
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
Jay B. Barney Zhang Shujun
- 16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Evidence from China
Fang Junxiong
- 41 A Study o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u Yangchun Wu Yao
- 61 CEO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Song Yuanyang Tang Yuejun Zuo Jingjing
- 78 The Short-Term Market Response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Share Structure Reform in
China
Ren Guangqian
- 101 Return Spillover Effect of RMB /USD to Chines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 Based on SVAR
Model
Huang Feixue Kou Ling Gu Jing Wang Yun
- 127 Call for Papers —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中国管理研究之展望

——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

Jay B. Barney 张书军^①

摘要: 中国管理学术的发展存在两种可能演进路径: 第一, 发展中国管理理论——侧重于在中国背景下运用与完善其它情境中发展出的管理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 正在兴起的中国经济给验证与完善通用性的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天然实验室。第二, 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着力于对中国独有的管理现象给出解释。为更好地阐释中国现象, 该路径应摆脱西方学者设定议题的制掣, 而由中国学者自主、创造性地开发研究议题。最后, 本文就中国管理研究之未来路径选择的意义, 以及两种路径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中国管理研究、理论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

^① Jay B. Barney,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费雪商学院; 张书军, 中国广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本文英文版本为 Barney, J. and S. Zhang, (2009),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Versus 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1), 15-28. 本文曾报告于 2008 年 6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协会第三届双年会“MOR 专题论坛——开发还是探索: 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

林中两路分，可惜难兼行。
游子久伫立，极目望一径。
蜿蜒复曲折，隐于丛林中。
我选另一途，合理亦公正。
草密人迹罕，正待人通行。
足迹踏过处，两路皆相同。
两路林中伸，落叶无人踪。
我选一路走，深知路无穷。
我疑从今后，能否转回程。
数十年之后，谈起常叹息。
林中两路分，一路人迹稀。
我独进此路，境遇乃相异。

——Robert Frost, 《未选择的路》，1921（译者：关山）

一、引言

在诗中，Frost 唯美地描述了不确定情况下决策所面临的挑战。通常，各备选路径的优劣势是不清晰的（“两路皆相同”），对个体而言，道路选择实非易事，尤其是尝试两者得兼（“可惜难兼行”），并且这些决策通常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我疑从今后，能否转回程”）。但是，诗人也提醒了我们，无论决策多么困难，我们都终究要做出决策，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穿越那片“丛林”；而回头来看，从路径依赖意义上讲，我们做出的选择最终将“境遇乃相异”。

如诗中所描述的游子，中国的管理学者也正面临着类似选择——应该选择何种路径来拓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呢？中国的学术研究要致力于演绎式的理论发展与检验，还是要致力于归纳、浓描式的研究（Geertz, 1973）？中国的学术研究是为了知识而研究知识，还是要关注知识的应用与提升企业绩效？我们要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与套路来训练中国的管理学者，还是要致力于发展中国独有的研究路径？

不论如何,中国管理学者所面临的选择并不比诗中游子来得简单。Frost假定丛林中已存在两条穿越之路,而中国管理学者的研究选择目前可能还很模糊。事实上,中国的研究未来还处于创造之中——中国的管理学者、被研究的企业和管理人员、回应此类研究的审稿人与编辑,以及阅读这些研究的全球管理学者们,都是这一创造进程的关键贡献者。这些个体与机构所做出的选择,对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将有着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还正在兴起(Mintzberg和McHugh, 1985),这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和动态演进特征的发展过程,事前我们是难以对其最终结果进行预言的(Arthur, 1990)。中国管理研究的兴起,非常类似于研究某一新企业或新产业的兴起——其未来并非命中注定,而是由参与其创造过程的个体和机构所决定的(Alvarez和Barney, 2007)。

然而,不论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如何演进,都似乎需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已被不同学者以不同方式讨论过了(March, 2005; Meyer, 2006; Peng, 2005; Tsui, 2006; Whetten, 2009)。借助分析中国管理研究发展的两种可能路径,本文拟对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探讨,即中国管理研究应该是致力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呢?

本文旨在描述这两个备选路径,讨论与各路径选择相关的问题,以及在此两路径间建立联系时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由于各路径所要求的套路颇为不同,单个学者很难选择两路兼行。我们也认为,强大的制度力量或许使某一路径显得比另一路径更有价值,但是,对于中国管理研究的整体发展而言,一些学者选择前一路径而另一些学者选择后一路径,将使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更为受益。

二、中国管理理论

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在这句话中，毛泽东含蓄地认可了接纳现有理论与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中国背景下的优势。将这个逻辑扩展到中国管理研究的演进层面，很自然地就引出了中国管理研究的第一个路径，即发展中国管理理论。

这样的研究路径将着眼于对现有理论的应用，中国学者可以以个体、群体、群体间、部门、企业或企业间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对这些既有理论加以应用——尽管在不同对象研究中应用的理论会有所不同。有鉴于此，对组织行为学、组织理论、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等既有理论的深刻理解，是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先决条件。

当然，在没有理论的条件 下研究中国管理也并非不可能。考虑到中国经济之于世界的重要性，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研究专注于对中国现象本身的描述，但是，仅有这些描述性工作是不够的，只有这类描述性工作与理论——不论是既有理论还是最新发展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时，它们才可能成为科学事业的一部分（Hubbard、Vetter 和 Little，1998；Tsang 和 Kwan，1999）。

多数可应用于中国情境中的既有理论都是从西方情境中发展而来的（Li 和 Tsui，2002；Tsui、Schoonhoven、Meyer、Lau 和 Milkovich，2004）。将这些理论放到中国情境下加以应用，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证实、拓展、甚至修订既有理论的重要机会（Tsui 等，2004）。中国情境与西方的不同，最终可能使管理学者辨别出西方组织和管理理论中那些未阐明的假设。识别出这些未阐明的假设，使它们变得更为明确，并努力拓展既有理论将这些假设纳入其中，会有助于我们发展出更具通用性的理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更具通用性的理论在其发端的西方情境之外也应同样具有适用性。

（一）中国管理理论之研究类型

一般而言，在中国情境中应用既有理论来完成的研究有三类：第一，学者们可以找到那些似乎能给某个（些）既有理论提供例证的中国现象，研究这些现象将有助于强化这些理论的通用性，因为不论该现象所处的文化或制度情境有何不同，这些理论都能对该独特现象给出解释。

目前，大部分中国管理研究都属于这种类型，即寻找能够印证某个或某些既有理论的中国现象。例如，对“关系”的研究通常应用社会资本理论（Luo，2003；Park 和 Luo，2001；Peng 和 Luo，2000；Tsang，1998；Xin 和 Pearce，1996）。尽管中国的“关系”存在一些独特特征，但总体而言，“关系”在中国和社会资本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有着同样的运作方式，发挥着同样的职

能(Park 和 Luo, 2001; Redding、Norman 和 Schlander, 1993; Tsang, 1998)。因此, 总体而言, “关系”研究倾向于印证社会资本理论的大部分基本假设。或许可以这样说, 对“关系”的研究是迄今为止研究社会资本蕴涵与影响的最好方法之一(Park 和 Luo, 2001)。

第二, 学者们可以找到那些看起来与源自西方情境的理论相矛盾的中国现象, 然后证明这些矛盾并非真的存在, 现象事实上与这些理论的判断仍是一致的。对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一些近期研究就是第二种研究类型的一个例子(Perkins、Morck 和 Yeung, 2006), 初看, 我们似乎难以用传统的理论, 不论是代理理论(Jensen 和 Meckling, 1976), 还是资源基础理论(Barney, 1991), 来分析和理解这些并购行为。但是, 当知道了与这些企业如何获得资助(通过各类型的政府补贴)、企业高管的决策动机等越来越多的有关信息后, 企业的这些收购决策在传统的理论逻辑(此例为代理理论)上也变得合情合理了(Perkins 等, 2006)。从这个意义上看, 尽管研究开始时人们并不能预见到这种结果, 但这种研究最终将增加某既有理论的通用性。

当然, 此第二类研究所揭示的问题是颇有讽刺意味的: 研究的种种努力是为了说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所存在的差异不过是看上去的差异罢了。有时, 拓展既有理论来解释独特中国现象的努力可能不得不彻头彻尾地改变该理论, 因而可能有必要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Kuhn, 1962), 这就是在中国情境下可从事的第三类研究。

第三类研究旨在发现那些与既有理论看起来存在矛盾的中国现象, 然后证明, 这种矛盾是切实存在的。由于如下原因, 这类工作的开展将十分困难: 首先, 一般而言, 鲜有这样的现有(西方)理论, 有着精准的预言, 能确切指出中国现象与这些理论真的矛盾。第二, 即便一些预言能被确认、一些矛盾能被证明, 论文的评审与发表过程将遭遇很多问题——很多审稿人和编辑都显得保守和不愿接受新事物。审稿人往往会极力说明中国现象与既有理论间的矛盾不过是看上去的矛盾。也即, 审稿人会试图将此第三类研究转变为第二类研究。基于这些原因, 这类工作是很难被发表出来的。

难以发表这类研究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因为从科学上来讲, 此第三类研究可能是最具有价值的研究, 至少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角度而言是这样的(Kuhn, 1962)。事实上, 使中国在科学意义上变得重要的东西在于, 似乎有一些不能用既有理论来解释的中国现象, 因而需要发展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它们(McKinley、Mone 和 Moon, 1999)。

当然,如果此中国管理理论路径被采纳了,这个新的理论不能只在中国情境下具有适用性。任何这类新的理论都必须包含既有理论,并且在西方情境和中国情境下都同样适用。这是因为,发展任一中国管理理论的目的旨在创造一个最终独立于区位的理论。因此,中国管理理论对现有理论的修订,都必须比之前的理论更应具通用性,并且能应用于多种不同特定文化和制度背景之中。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发展中国管理理论,那些只能解释中国情境下的中国现象的中国理论是不重要的,因为这样的情境专用性理论不能解释个体、群体或企业行为的一般规律。相反,正如我们将要论述的,发展情境专用性的理论是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的要求。

(二) 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其他意蕴

致力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也有着一些其他意蕴。首先,从事这类工作的目的可能是在最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目前,这些期刊大都是英文期刊,包括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国际商务研究学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和战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这七本杂志一贯被认为是管理领域的顶级刊物(Peng、Lu、Shenkar 和 Wang, 2001)。倘若要发展一个通用的中国管理理论,则以中文撰写并在中文期刊上发表就显得鲜有价值,因为这类研究的目标读者并不仅是中国学者,而是在某特定理论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全球的学者们。

第二,这类研究可能还要遵循当前科学实践和文章发表的一些习俗。例如,尽管一般而言这类研究可以是归纳性的,也可以是演绎性的,但在实践中,在顶级刊物上发表的多数研究都是演绎性的。类似地,在顶级刊物上发表的多数研究在方法上是定量而非定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归纳和定性的研究是绝对不可能发表在这些顶级刊物上,而只是表明这些顶级刊物过去几十年来发表的文章在性质上多是演绎和定量的。

第三,在学科基础方面,发表在这些顶级刊物上的大部分研究或者应用了心理学、社会学或经济学,或者整合了上述多学科的理论精髓^①。超越这

^① 关于管理学是否是一个理论学科的讨论并非本文探讨的议题。但是,即便管理学是一个独立的理论学科,上面所列举的诸多社会科学仍是管理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学术土壤。

些制度规范来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努力多半是不容易成功的。

第四,从实践角度看,投身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学者们,尤其是青年学者们,可能需从那些精通西方理论的资深学者身上获得一些基本指导。这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来实现:从短期的访问学习到到在西方院校里攻读博士学位都是可选的方式。但是,在这个新世纪的开端,学习用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技能的佳方式很可能是透过国际合作,尤其是通过与已参与到管理理论发展的个体的国际合作来学习这些技能。在大部分这种合作中,资深学者多是来自西方的。

当然,随时间流逝,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善于在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并且善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时,从西方学者身上学习或者与西方院校建立联系的需求将会逐渐下降。

(三) 发展中国管理理论中的局限性

专注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有许多优势。它为学者们的研究活动提供了一条明确的前行道路,也提供了通过采取“借鉴旨在改良”战略来拓展和深化既有理论的重要机会(Whetten, 2009),它还有助于把中国的学术融入到更为广阔的国际“无形学院”中去(Price, 1963)。但这种路径也有一些潜在的局限性。

特别地,选择这条路径将导致中国学者的研究议程被西方学者的以往理论和研究所设定。即便西方学者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即便最初发端于西方情境的理论有诸多可学之处,也没有理由先验地认为理解中国现象的最佳工具是那些脱胎于西方经验的理论。事实上,很可能的情况是,有一些中国现象只能用中国独特的方式来予以理解。这就引出了中国管理学术发展的第二条路径——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而非发展中国管理理论。如果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是可行的,那么不探索这个路径就可能导致中国学者无法对中国经济与组织中那些最为独特和有趣的方面进行有洞见地研究。

三、管理的中国理论

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而资于内。然尚有其要者,国学

是也。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

在这句语录中，毛泽东认识到了从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但同时提醒人们要避免国学被西学所淹没。将其应用到管理学术的发展，毛泽东是在呼吁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发展出它们自己的管理理论。由于大部分（但绝非全部）早期的管理研究是在美国完成的，因而发展出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管理的美国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此管理理论发展中的“先动者优势”迫使世界范围内的学者要对理论的美国版本做出回应：或者拓展它，或者反驳它。

例如，金融领域中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资本市场是由大量的个体投资者所塑造的（Brealey 和 Myers, 2003）。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兴起，资本市场的这一特点即便在美国都不再适用了^①。有效资本市场的这种假设对于世界上大部分资本市场都是不适用的，因为不少国家的资本市场均受控于少数几个家族企业（例如韩国的三星、LG 和韩进）。如果对资本市场的第一项研究是由智利学者完成的，那么他们可能发展出以“资本市场是由少数几个家族企业（例如智利的智利石油公司、法拉贝拉公司和CMPC公司）所主导”为假设的资本市场理论，而美国的市场可能仅被看作是一个例外。

就这样，用于解释美国管理和组织现象的美国理论，在过去几十年里就给管理研究的议事套路定下了基调。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独特历史和演进特征，那些最初旨在理解美国管理和组织的研究议题和套路，似乎并不特别适合于理解中国的管理与组织（Tsui, 2006）。至少，对那些试图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学者而言，是需要对美式理论的通用性进行极力辩护的，而对那些试图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学者而言，这种辩护则是很值得怀疑的。

然而，发展一个用于研究中国管理的中国式独特路径是相当富有挑战性的。当只能用中式套路来理解（尤其是不能用发端于西方经验的理论来理解）中国现象时，管理的中国理论才可能最具生命力，也才可能产生出最为丰硕

^① 2003年，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控制了全美资本市场19.634万亿美元资产，占总权益资产的比例高达19%至20%。参见美国经济咨商局2005年9月发布的1376号报告《2005年机构投资报告：美国 and 全球趋势》（Brancato 和 Rabimov, 2005）。

的成果。起初,这可能看上去和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第三种类型完全一样,即中国现象无法用现有的西方理论来加以解释。但是,那些从事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第三类研究,其最终目标是在于发展出同时能在中国和非中国情境下都可适用的理论,而对于那些寻求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学者而言,他们不大会介意其成果在中国情境以外是否具有通用性,而更关注能否以独特的中国套路来解释中国现象,这些理论是否具有超越中国情境的通用性,是那些致力于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学者所不太关心的。

这样的中国理论几乎毫无例外地会强调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通过研究中国独特的现象或者对中国有着独特意义的现象,这类理论将专注于给出只适用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处方和社会处方。因而,这类研究通常会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只有少数熟知中文并对中国制度有足够了解的西方学者才能识别和领会到这项工作的独特贡献。然而,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学者而言,由于语言障碍无法知晓这种研究的内容,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似乎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成果将有助于这类知识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传播与扩散。

有时候,在这类研究完成初期,我们可能并不清楚所发展的理论是对管理的中国理论有贡献,还是对中国管理理论有贡献。这是因为,任何工作刚完成时,可能都不清楚它能否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和既有理论实现有效融合和对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并且这也正是研究的主要目标的话,那么该项研究就成为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并且如果从事此项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为发展更具广泛意义上的组织和管理理论做出贡献,那么该项研究就可被认定为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努力中的一部分。

以 Cheng、Chou、Wu、Huang 和 Farh (2004) 对中国组织中家长式领导所进行的研究为例:这些作者认为,他们的领导理论在中国情境下有很好的适用性,并且比传统的西方管理理论有更好的解释力。这种论证逻辑与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是相一致的。

相反,如果家长式领导同样也存在于西方组织,或至少在某些时候也存在于西方组织,并且如果关于中国组织的研究能对以西方组织为对象的家长式领导研究提供指导和借鉴,并最终发展成一个更具通用性的领导理论,那么这项研究就是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逻辑相一致的。

在另一项范例式研究中,Xiao 和 Tsui (2007) 指出,在集体主义国家文

化下，结构洞的优势将不太容易被体现，他们将发端于西方情境的结构洞理论引入到中国情境中，来检验他们的论点。这种论证逻辑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是相一致的，因为这种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拓展结构洞理论，使其在中国情境之外也同样具有适用性。但是，如果其它类似情境下的研究无法同基于中国的研究一样，给结构洞的文化特性提供类似支持的话，这种研究则可能对发展一个管理的中国理论提供了支持。

即便发展具有通用性的组织和管理理论并非学者的目标，在科学意义上依然会有一些很正当的原因来促使我们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当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下无法适用，而我们又死死抓住西方理论，不能投身于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时，使我们想起了这样一种情景：某人在街头遗失了钥匙，却只在路灯下寻找，因为在他（她）看来，那是光明仅有的地方。研究独特的中国管理问题，可能需要我们离开西方理论的“光明”，来开发照亮中国经济和组织中黑暗部分的新光源。在鲜有过往理论的指导下，走进知识中的盲区，需要的不仅是智力勇气，还常常是个人勇气。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管理理论和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所需的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一样的。毕竟，发展中国管理理论和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都需要在学术上殚精竭虑。寻求对独特中国现象给出独特的中国解释的学者们必须熟知非中国化的理论，避免闭门造车式的研究和理论发展中的重复“创造”，以确保所发展出的理论的确是中国所独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未来几年中，学习西方资深管理学者的经验并与其合作，可能依然是中国学者学术训练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通过这种训练所掌握的技巧应主要用于以中国独特的方式来解析中国现象。目前，管理的中国理论主要还是发表在中文期刊上，我们希望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也能看到这类成果。我们鼓励研究人员把他们对管理的中国理论的深刻洞见在英文期刊中发表出来，使世界其它地区的学者也都能从这样的理论中汲取营养，为他们搭建把各自的研究议题与这些中国理论联系起来的桥梁。

四、路径选择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

那么,在中国管理的“丛林”中,应该选择哪一路径呢?该领域的演进是否就像 Front 在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一条路径一旦被错过,就没有再选择的机会了呢?还是,与诗中游子的境况不同,我们有着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现在选择一条路,迟些时候再选另一条路,甚至可同时选择两条路径呢?深谙辩证法真谛的毛泽东明白,同时追求两条对立的路径是有价值的。对立路径间存在的张力,正是崭新洞见产生的最常来源。在中国管理研究的演进这一问题上,或许也是这样的。

(一) 单个学者两路兼行

当然,由于同时追求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存在着优势,对单个学者而言,尝试选择两条道路似乎是颇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样做既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中国管理理论进行对话,同时也能参与到聚焦于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对话之中,但是鱼与熊掌是否可以兼得仍是一个留待实证检验的问题。或许会有一些学者可以做到两手都抓且两手都硬,能同时进行两种不同类型的理论研究。但是,总体而言,这似乎不大可能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选择。

特别地,这两种路径各自的对话套路在过去是相当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研究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学者可能认为研究中国管理理论的学者“崇洋媚外”,仿效西方的研究对本土知识和管理实践鲜有价值。研究中国管理理论的学者则可能由于不熟悉用于理解管理的中国理论所需的学术语言和/或实际语言,而低估后者的理论价值。幸运的是,随着中国国内外学者间对话的不断扩大和深入,这种误解和偏见逐渐在消失,了解和共识在不断增加。如成立于2004年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和其在2005年推出的会刊《管理与组织研究(MOR)》就是一个很好例证。作为中国管理研究进行

学术对话的优秀平台, MOR 和 IACMR 两年一届的年会将一如既往地帮助两条路径上学者们更好了解彼此的进展。两条路径上的学者已逐渐达成共识: 尽管这两种路径颇为不同, 但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显然, 要做到对上述任一对话有所贡献, 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和专注。同时对两条路径上的对话都有所贡献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和/或不同时间点上, 学者们不可以从事上述不同类型的研究。能做到这一点的学者对促进两条学术路径的相互学习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跨越路径的学习

实际上, 鉴于鲜有单个学者能同时对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研究均有贡献, 因此, 当前亟需设计与发展一系列的制度来促进这两类不同学术套路间的相互学习。例如, 可以在学术会议上设立两个分会场, 分别探讨与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有关的议题, 让学者们自由地选择参加不同主题的讨论, 并尤为鼓励他们参加与各自研究主题不尽一致的讨论。

当然, 从这类会议中到底能学到些什么是难以预见的。但至少, 从研究中国管理理论的同行身上, 管理的中国理论的研究者可能了解到哪些理论、方法和现象并不是他们所需要关注的。同时, 研究中国管理理论的学者们可能从其他同行那发现一些独特的中国现象, 以验证与拓展他们理论的通用性。尽管我们无法预见路径间可以彼此学习的细节, 但有一点却是可以预见的, 即这种学习的巨大潜力是可以完全预见的。

五、制度压力

当前,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 在西方英文期刊上发表成果越来越为学界所倡导, 这种日益强化的制度压力, 促使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的亚洲学者)越来越专注于从事有助于推进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尽管可以由此批评说, 这是中国学者缺乏学术自信、不愿致力于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的一种表现(Meyer, 2006), 但从长远眼光看, 对年轻学者而言, 首先从事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 并取得相应的成果, 在此基础之上, 再从事管理